



中国近代史 论丛稿

李 侃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自序

《中国近代史论丛稿》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三本论文集。

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我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算来已将近40年了。我的研究成果虽然单薄而肤浅，但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兴趣却从未减退。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尽管几代历史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成绩，不过，我仍感到，有许多问题还值得再思考、再探讨和再认识。

中国近代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最剧烈的历史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斗争角逐，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各种各样的人物不断涌现。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在研究实践中除了有一段时间曾着重研究思想文化史而外，涉及的领域较多较广，因而研究的内容比较杂，深度也很不够。这本书所收入的文章，主要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社会矛盾和斗争激烈，社会变革深刻。历史学界讨论的问题比较多。我在一些文章里，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不敢说成一家之言，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某些历史问题发出了

自己的声音。

收在本书里的文章，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在国内、国际有关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呈现出空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各种学术会议不断举行。而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和讨论的事件与人物几乎每年都有，而且不止一次两次。讨论会的主办者照例要确定每次讨论的主题，并要求出席者提供论文。这种命题作文的办法，虽然因为平时缺乏准备有时感到为难，但是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要促使我必须去阅读有关的资料和著作，思考有关的问题。我的不少文章就是这样被“逼”出来和被“挤”出来的。当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虽然相当吃力，但过了若干时日，积累起来也就有了相当的数量。

研究历史就不能不表现研究者的历史观。以中国近代史而言，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怎样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认识封建主义的压迫，怎样认识中国近代的变革和革命，怎样评价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研究者的历史观。有人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讲历史观，就是强调意识形态，甚至是“左”的表现。其实，评说历史而不表现历史观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容否认和回避的客观存在。以抗日战争为例，中国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世界众多正直的历史学家，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进行了揭露和谴责。而日本有些政界人士，不但否认侵略，而且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这难道不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吗！当然，我并不赞成把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意识形态绝对化、公式化。在历史研究中，不必在

历史观问题上强求一律。在历史学术问题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自由讨论。不过我个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科学的历史观。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有千言万语，但简单地说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在这本书中，有的文章写了毛泽东的历史观问题，有的写了郑孝胥和伪满洲国。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呢？我历来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到终结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个观点，曾得到史学界多数同行的赞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由衷地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特别要感谢赵群同志。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本书编辑过程中，在文章选定、文稿校阅等方面，还得到儿子李格、儿媳刘建光的协助。在我患病期间，他们不分寒暑，风雨无阻，每天都到医院去护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劳和关心，这本书也是难以出版的。

在有生之年，我本来还想对中国近代史再做些研究。不料在1995年4月初忽然得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一年。在病中翻阅这些文章的时候，还想对某些篇章做些修改，但是力不从心，未能做到。但愿天假以年，把自己曾经设想要研究的课题，再继续思考和研究。至于能不能写出文章和著作，就要看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如何了。

李 侃

1996年2月16日于中日友好医院

目 录

自 序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	(1)
——近代中国三个划时代人物及其救国方案的比较	
大冲击和大转折·····	(20)
——第一次中日战争对中国的打击和影响	
清末中日关系何来“黄金十年”？·····	(36)
翁同龢略论·····	(54)
从江苏、湖北两省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76)
——兼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的关系	
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	(110)
东北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琐议·····	(139)
再谈中国近代农民问题·····	(155)
胡适与张元济·····	(169)
所谓孙中山“激进主义”质疑·····	(188)
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一点历史考察·····	(200)
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	(208)
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	(233)
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248)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

——近代中国三个划时代人物 及其救国方案的比较

1842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殖民者的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丧失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传统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之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另一个最主要的矛盾。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转折过程中，作为最早的特许官准通商口岸的广州，清代中叶以来一直是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成为镶嵌在封闭的中华帝国大厦上的一个小小“窗孔”久久与世界市场遥遥相对。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从这个“窗孔”中除了看到西方可供玩好的“奇技淫巧”之外，几乎什么也未看见，甚至也不想看见。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用鸦片敲碎了这个窗孔。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中英贸易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鸦片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逐渐由出超变为入超，传统的土产品出口和奢侈品入口的贸易为鸦

片贸易、鸦片走私所压倒。鸦片经广州口岸滚滚流入，英国资产阶级终于通过这个窗孔以武力攻破中国大门。于是，广东人民不仅深受鸦片毒害，而且首当其冲地蒙受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武装入侵后的烧杀抢掠之苦。由此，也最早在这里开始并坚持了禁烟斗争，最早举起了反抗侵略的旗帜。西方殖民主义武装侵略和鸦片的涌入，西方近代事物、资产阶级进步思潮也开始从这洞开的国门不断前进，使广东成为最先接触西方近代事物、近代思想的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发源地。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与革命进程中，杰人辈出，灿若繁星。

正是在这中国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从鸦片战争 10 年后到 20 世纪初的 60 年的时间里，以广州为中心，周围半径不足 200 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涌现出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个划时代的人物。他们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救世理想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的剧烈动荡的时代。一方面，全国规模的农民武装反抗斗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频频爆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向当时的中国提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反抗殖民侵略两大紧迫而严重的课题。这是以往的农

民革命领袖所从未碰到过的新问题。当历史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刻，应历史的呼唤，洪秀全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洪秀全 1814 年 1 月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传统封建教育，从 16 岁开始直到 31 岁，15 年间一直热衷于科举仕途，但四度应考，四次都“不能进黉门为秀才”。1843 年最后一次考试失败之后，他开始“潜心细读”《劝世良言》。由此，开始了由崇敬孔子到信仰基督的转变，由信奉上帝“救世”到反清革命的转变。

作为第一种转变，对于洪秀全来说，是有其心理契机与思想基础的。经历了数度科场碰壁之苦，洪秀全满怀遭仕途摒弃的愤懑与迷茫，产生了一个特定的心理环境，而《劝世良言》对“儒教”有这样的批评：“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佑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然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①这种批评虽然肤浅，但是很容易使洪秀全把这种批评与清朝的统治腐败，科场黑暗，社会弊病联系起来，起到心理的共鸣，引起他对往日传统信仰的疑惑及失望。特殊的情绪与独特的说教相融合，构成了洪秀全接受上帝福音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从而为洪秀全实现从一种多神宗教向另一种一神宗教的转化提供了条件。这种转化虽然仍不能使他完全摆脱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但是却激发了他捣毁寺庙偶像、孔子牌位，藐视千年来封

建权威的革命勇气，放射出了敢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进行挑战和批判的光彩。

关于洪秀全的第二种转变，则是与前面提到的历史的演进紧密相联的。1843年7月，洪秀全创立了秘密团体拜上帝会，开始了他宣讲基督教教义，由初期的上帝救世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目标的跋涉。从在广东传道，到人广西发展拜上帝会组织，从在紫荆山区建立革命基地，到发动金田起义，从永安突围到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天国的声威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奔腾咆哮的农民革命高潮。

随着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日趋激化，两广、湖南等地群众武装起义云涌，洪秀全也由他初期在《原道救世歌》中宣传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一切人享有平等的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反对淫忤父母，反对行杀害、为盗贼、巫覡，反对赌博、吸洋烟等“六不正”行为的净化道德的“救世”思想，发展到在《原道醒世训》中追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之言，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进而到1847、1848年，在《原道觉世训》中指斥“阎罗妖”“最诈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公然蔑视清王朝的君主权威，“他是何人，敢膺称帝者乎”，并

在《太平天日》中把自己虚构为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拯救世人，造出了一个人格化的神，突破了他以往的“救世”方案，明确了反清的革命态度，最终走上了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所设计的人间天国的蓝图，作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纲领，它集中反映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农业社会主义救国理想，是洪秀全“救世”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改革土地所有制，其基本原则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不论男女，算其家口多寡”，“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在分配问题上，以否定私有财产为基本原则，以“两”为社会基层组织 and 单位，每两为25家，设国库一，收成时，留除25家所需，余皆归入国库，“人无私财”。25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为了保证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经济模式的确立，《天朝田亩制度》又制订了社会组织准则，设军帅、师帅、旅帅、五卒长、两司马、伍长、伍卒，从上到下层层相属，营造起一个高度军事化、集体化的社会结构，由此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总目标。^②

《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蓝本，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与要求。它虽然具有中国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意义，却无法掩饰它的小生产者的封建落后性质。平均主义毕竟是生产

力低下、物质极端贫乏的原始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人温饱，家家幸福的平均主义理想虽然美妙，但实际上它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照此施行，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阻滞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洪秀全这一改造社会的救世方案，终究只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乌托邦，一种无法实现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付诸实施，代之而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这是洪秀全等农民领袖不得不接受的客观现实。

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家，无法摆脱自身存在的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④；作为一个曾经苦研经史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又难以彻底消蚀传统儒学所镌刻的思想痕迹。矛盾的阶级性格和矛盾的思想性格，使他在革命斗争中一度冲破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传统的束缚，将革命的矛头直指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捣毁偶像，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的种种措施。然而，随着自己统治的建立，却又不由自主地用封建绳索把自己和起义的农民重新束缚起来。他要维护皇权主义，重登专制宝座，竖立起天王的个人权威；他滥封王侯，设置愈益森严的等级关系；广置妻妾妃嫔，对宫中女眷定立繁琐苛刻的清规戒律，如此等等。在阶级与思想的局限下，在旧传统的限制和束缚中，他终于回归封建传统，演出了一幕农民革命的悲剧和杰出人物的个人悲剧。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的救国方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新的屈辱的一页。清朝统治者对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迅速地将中国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各列强国卷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空前的民族危机使整个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更加突出，爱国主义救亡运动奏出了黄钟大吕的洪音。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社会力量不断增强。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统治暂时的表面稳定和革命低潮，不但未能缓解深重的民族危机，而且随着甲午惨败和洋务幻灭，中国已面临“瓜分豆剖”的险恶处境。面对严峻的现实，应着历史的呼唤，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被推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

康有为1858年诞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阶级大血战的烽火和民族大屈辱的退潮之中。出身于广东南海县一个“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官宦之家，他青少年时代即受传统封建教育的熏陶，由研考据、习八股而潜心古文经学。但是，西学的启迪，龚自珍、魏源以来以今文经学议政，主张改制的进步思想倾向的影响，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华民族危亡的刺激，对清朝腐败的愤慨，使他跳出了传统封建士大夫的老路，由尽弃古文经学的旧说，打起公羊学派旗号，痛斥“伪经”，提倡托古改制，揉合中西之学，创

造理论，宣传变法维新，而最终走上爱国救亡、革新政治，领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道路。

早在1888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时曾草疏《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法图强的要求，轰动京师。此后，从1895年5月领导著名的《公车上书》，到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又连续五次向清帝上书，并陆续呈进《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为救国图强绘制了蓝图。康有为的基本政治构想在于：

第一，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认为造成“中国败弱”，“百弊丛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政体，过去的“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政”等洋务“新政”，就是由于没有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所谓“廷议变法”，“补苴罅漏，弥缝缺失”，根本不净，致令“百事皆非”，“徒糜巨款，无救危败”。^④据此，他主张“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以使“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共体”。^⑤并进而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即谓“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由此“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⑥要求光绪帝“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⑦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提出设立法机构，即“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指派王大臣总裁，制度局下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

历、社会、武备等12局行政机构以“分其事”，^④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体制。第二，要求学习西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康有为看来，“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颠乎？”^⑤由此提出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及教民之法。以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等六法富国，令国家发行钞票，自铸银元以收利权，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准予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币制，开发新式交通运输邮政和原料工业，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法养民，提倡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奖励科技发明、减免二税，保护商业、抚贫养穷，安抚民心；以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四法教民，倡导广开民智，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实际上是主张在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

康有为作为新兴的从地主官僚阶层转化过来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勾勒出了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专制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救国蓝图，这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和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康有为也局限于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反对西方侵略，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却又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主张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却又反对

实行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却又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土地关系，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设计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却又迷信光绪皇帝，走一条自上而下，“以君权变法”的路线。这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康有为的救国方案无法得以实施的命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康有为也不得不辗转香港、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将康有为与洪秀全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是广东人，前后相距不过几十年，但由于所代表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受到洪秀全的思想影响。在康有为思想形成的过程及著作言论中，他宣讲经学，鼓吹改制，阐扬西学，幻想“大同”，以其维护清政府的政治态度、对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不乏贬损之词与恐惧、仇视心理。他所注目的是士大夫阶层、学者、维新人士，在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格格不入。即连他的乌托邦式的“大同”学说，也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只字不提。康有为与洪秀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阶级阵营的杰出人物。

康有为与洪秀全所处的时代都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反抗殖民侵略的历史任务。但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刺激着爱国人士去重新深入地思考救国之策。而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出现与成长，又为康有为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阶级基础。作为一个新阶级的代表的康有为，尽管他还属于由地主官僚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

的上层，尽管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相当弱小，资产阶级还不成熟，不具备独立的社会地位，但却宣告了新的生产力的产生，萌发出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前途，这是洪秀全的时代所缺乏的内容，是脱不出旧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窠臼的洪秀全及其所代表的农民阶级无法比拟的。康有为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完全、不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虽然在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态度上，康有为远比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逊色，但是，从救国方案上看，洪秀全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是“停滞社会的产物”，是向上古之世回归的乌托邦，而康有为的救国纲领是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即便是康有为构造的“大同”社会蓝图，也是一个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以存在资产阶级“私产”，由“富人”统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康有为的治国之策较之洪秀全的兴邦思想是一个质的飞跃；就历史发展的趋向和社会前进的性质而言，康有为的道路比洪秀全的道路更进步一些；康有为和他的门生、助手、同道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制度变革的尝试。其变法虽然短命，却影响了整个社会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爱国志士。故此，从“百日维新”的深层社会影响上说，它并不下于延续16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而就社会思潮的影响来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 的兴国蓝图

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洪流中，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代表孙中山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而正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⑨

1866年11月，孙中山诞生在广东香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作为农家子，他与洪秀全有着相似的身世。但是，孙中山并未受过多少传统封建教育，青少年时期即受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及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接过洪秀全“反满”的旗帜，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新的理论指导下，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构造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继承洪秀全，批判洪秀全，又远远超越了洪秀全。

孙中山比康有为仅小8岁，他们共同处于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大时代，共同面临着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难。但是，孙中山有着与康有为完全不同的身世和幼年教养，与康有为代表着不同的资产阶级阶层，走的是与改良、保皇不同的革命、反满的救国道路。孙中山早期与康有为一样，不满于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要求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社会，并采取与康有为同样的议政方式，所不同的只是他没有上书皇帝而是上书李鸿章，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